

吴旗县党史资料丛刊

(第四十期)

中共吴旗县委党史资料

征集小组办公室办

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我谈“三边事变”

张明科

三边事变的起因是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和北方局特派员朱理治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恶果。具体事变是：

一、由于肃反运动扩大化，把红二十六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王世泰、刘景范以及营以上和县以上领导干部大部分被捕关押在瓦窑堡，且杀了大部分革命同志。这就引起了西北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苏区群众的恐慌不安，也给地主、反革命分子可乘之机。

二、反动军阀团匪、地主、反动富农乘机造谣惑众。使得广大群众辨别不清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作为游击支队长也搞不清是因为什么把二十六军的领导人关押起来。幸亏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告诉我：这是党内斗争问题，不用担心，以后党中央会作出正确处理的，并要求我大胆工作。当时我们游击队活动的

保安县西三区农民要求搞交农运动，我根据逢春的指示，给农村广大干部作下工作，使之得到制止。

三、正是由于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对地主、富农采取了扫地出门，底财、浮财一律没收，并且侵犯了富裕中农的利益，没收了其财产，使得中农人家心情不安，也影响了自耕贫农，孤立了雇农，致使广大农民心情特别紧张。因为贫下中农、雇农和自耕贫农关系十分密切，这给反革命分子可乘之机。就连刘景范亲堂弟和亲姐夫有一天来我支队，活动我游击支队叛变投敌，当时被我支队付队长戴同孝、中队指导员贺万祥发觉，要求杀掉这两个坏蛋，我念其与志丹的至亲关系，把两人骂了一顿，放走了。此事说明了敌人千方百计想把革命军队搞垮。后来我将此事给龚逢春作了汇报，逢春说做得对，如把他俩杀掉，一是不好公开向群众宣布他们的罪状，二是会引起群众的误解，三是又没有机会查清他们为什么搞反革命活动的行为。放了以后想法搞清他们还有什么反动行为，如再有反革命活动，抓起来开群众大会杀了也不迟，以后，再没有听到什么反动活动。接着毛主席派王首道等人把刘志丹等同志放出狱了。

四、当时赤安县领导同志奉上级指示，加之自身思想混乱，对于要捕金林、宗文耀仅派一个通讯员给黄万银送信，恰巧骑兵团政委把黄叫到保安县北川宋家庄开会，信落到宗文耀手，当政委回到部队后，黄被金林、宗文耀杀害，致使靖边百分之八十苏区被敌人破坏。南边县北部一些乡政权也被敌人破坏，只有定边县受损失小些。荣幸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到达吴起镇，二十日我把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杨其等人被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作了汇报，第二天龚逢春同志向毛

主席、周付主席作了详细汇报。毛主席立即派中央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等人带着电台由吴起镇直抵瓦窑堡，从狱中放出了刘志丹等人，从此挽救了西北这块根据地。吴旗“切尾巴战斗”之后，毛主席南下到西北根据地后方的下寺湾，周付主席到瓦子川一带，了解了陕甘周围敌军部署情况，开始布置了东到劳山，西至直罗镇，黑水寺战斗，由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一举歼灭了威胁陕甘苏区之敌军。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间周付主席亲自找刘景范、杨其谈话，让他们前往下寺湾，组织现有的武装部队把被敌破坏的苏区恢复起来，并继续扩大西北苏区，建立新的乡、区、县政府。刘、杨等人行至安塞县窑儿湾，夜间被土匪袭击，刘、杨二人越墙逃走时，杨其被土匪打死。刘景范连夜赶到下寺湾赤安县革命委员会，不料又与县主席袁万祥发生误会，后经周付主席亲笔信才解除误会。接着张策、朱奎等同志也来到下寺湾。随后接到袁万祥、刘景范的信，要我支队到要子川园印湾接受新的任务。我支队到达园印湾见到刘景范、朱奎后连夜商谈：一、支队编为保安独立营（后改为志丹独立营）；二、要恢复苏区，必须先消灭金林、宗文耀等匪徒。对小股叛徒派出一些小分队消灭如张克俭、康阴阳和刘老庄姓刘的。

新编独立营由三个连，一个骑兵团组成。我支队为第一连，连长戴同孝，指导员童之桂（长征掉队人员），二连是庆北支队为主和我支队所属几个小组的游击组。连长记不清了，指导员李义，三连连长阎怀智、雷海青。骑兵团队长姚俊，指导员张弟。独立营长马福琪，政委是朱奎。我任营立总支书记。不久朱奎因负伤调离，我任营政委。这一个营直至三六年十一月编入二十九军红一团，我任团政委。

开始消灭叛匪时，我们计划第一步由刘景范指挥，北上靖边死羊湾消灭金林、宗文耀。到了死羊湾后，叛匪及其家属已逃跑了。我们通过新城县城南下，顺沟南行到沟中间，突然遭到金、宗叛匪的伏击，正在危险之际，朱奎持轻机枪向高山坡敌群连射十余发子弹，打死打伤各一人，其余叛匪溃逃。景范命令骑兵队迅速向南山冲击，一小时后，消灭了大部分敌人，我方没有伤亡。第二天，部队行至保安县北宋家庄，消灭了地主领导的十多名叛匪。金林、宗文耀逃往宁条梁投靠张廷芝匪军去了。我们独立营回到杨青川瓦社村和赤安县西区中心区委书记王耀华共同研究部队行动的新方向。同志们一致认为先开展洛河以西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的游击区域。但是，要开发这一带地区，第一必须打掉蔺士升、齐文英两股团匪，第二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派人到白豹川找袁耀秀同志的游击队，把这两股团匪的一切行动侦察清楚，然后消灭之。

在歼灭蔺、齐团匪的战斗中，我带二连和骑兵队冲到齐家桥北山头，被敌用火力和部队压在一条三、四百米冷沟下，向上冲锋十分困难，在这关键时刻，袁耀秀率领游击队由南山下来，插向团匪的后路。团匪退路切断之后乱成一团，我指挥的二连和骑兵队乘机占领了制高点，接着一、三两连冲入团匪整个山头阵地。敌人因无力反抗全部缴械投降，团头蔺士升、齐文英被俘，从此，赤安县更加巩固，三边三县的各级政权相继得到恢复和扩大，各县、区的人民武装也建立起来了。反动地主也得到适合我党政策的原则，做了妥善处理。纠正了以极左路线对地主那种扫地出门的作法，分给其土地和劳动工具，安定了人心，并对苏区附近的白区的地富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边事变”中迫害了不少的革命同志，志丹出狱后，向二十六军出狱的同志反复作思想工作，要求同志们不必计较过去被关押之事，至于谁是谁非，中央将来会作正确结论的，并让一些同志看到西北军政干部后转达他的意图。我第一次见王世泰同志，他转告了志丹的意见。果然中央一九四五年在延安高干会上，澄清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是非问题，这样严重后果的产生都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致使西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都遭受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附带说几句，“三边事变”期间，我与上级联系的有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原赤安县主席袁万祥。

西北地方上来往联系最多人员中有白国明、袁耀秀、刘景权、王玉海、王士桂、李文秀、张万里、王悦贤、宗有仁、刘兴汉、李天鹅、戴同孝等（有些人我记不起了），作了不少通风报信工作，在我们革命事业遇到困难之际，他们都是有贡献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青海省军区张万镒（原名张连有）同志来信说：

我看了你们十一期《丛刊》感到很好，特别是刘景瑞同志写的回忆材料确实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也比较确切。我对第九期《丛刊》即“张廷芝罪行片断”作一点补充，也就是“三次掠夺杨青川劳动人民”的问题，上面说张匪剿了贺满朝和宗维正的家，远远不至这些。一九三五年三月，张廷芝带领大队人马剿红军住在我们礼拜寺庄。领导派我做青少年工作也

正好在家，张匪来时我们都跑到山里，在小庄斜脑畔上，我们父子兄弟全被瓦社住的张匪便衣队捉住，特别是把张连举拉到瓦社吊打一夜，几乎死去，因连举哥在谢子长部队对敌作战时打掉了左眼，无法辩说，只好让匪徒任意吊打，我们给送了很多酒肉钱财，才买了一条活命。再如我们庄张连举、张连官、张连堂、张连有（我自己）和张俊德、赵国祥等人因当红军，张廷芝说这个庄是红军窝子，又一次带其亲信把我们家财产抢劫一空，把礼拜寺庄几乎踏平。还有一次张匪到我们庄，我长兄张连会看见后拔腿就跑，那些家伙追到跟前照背心就是一枪，幸亏子弹瞎火未发，差点打死。这些都是我回家母亲和叔母告诉的，还说：“因为你们出去当红军把咱们家都全剿光了”。

刘景瑞同志写的（第十期）“中央红军长征到吴旗的一些情况”第8页第8行中，“中央红军抽出一个团，配合游击队、赤卫军分别围剿了金佛坪土围子和旦八寨的民团匪军，在两天时间内全部干净将这两处团匪全部肃清”。应改成“在短时间内先后全部肃清”就好了。因为旦八寨是三六年后半年才围开的。初开始是我独立营围困，后来红三团换我们西进后才把曹俊章团匪肃清的。

景瑞同志写的一些材料比较真实、亲切，我很喜欢看他这样的材料，请告知景瑞同志我敬佩他。

一九八二年七月一日

韩卿臣同志来信对“袁耀秀同志的回忆”（第二十四期）的补充：

“一九三六年我在陕北独立营一连三排当战士（年仅14岁），营长马福基、刘景范、朱奎，一连指导员张明科、连长戴同孝，排长屈生华、文书演进华，从游击队调来戴同贤任管理员。

我们独立营与郑占奎的骑兵在宁塞川打了蔡丰民团，缴获二十多支枪，骡子两条，俘虏二十多人，给每人一元银洋让他们回家去。古历正月二十四日上午，我们独立营在土佛寺对面河湾与袁耀秀的游击队会合后，当天晚上到白豹川石湾村台里召开了消灭蔺士升团匪动员大会，会后部队连夜出发经过小涧川，翻山越岭赶天明到了三道川齐桥土寨下边，部队正吃早饭时，袁耀秀领导的游击队把团匪抢去的绵羊赶上南山时，蔺士升团匪从高台脑畔山腰下来夺取绵羊群，这时我们独立营和骑兵与敌人接了火，在高台山上消灭了团匪，活捉了蔺士升、齐正英，打死常来祥，缴获短枪二支，步枪三十多支，马五匹，俘虏三十多人。我们连长右肩上受了伤。

另外，《丛刊》第四期中的“冯士彦”应改为“冯彦士”。

陕西兴平县塔巷居民5号楼 韩卿臣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日